



不可小瞧的 140 字

林少华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我新浪微博上留言:“一个人,不管心情好坏,每天都写微博,这很不容易——林老师,向您致敬!”多少日夜,多少网友,多少留言,而陡然把我拦住不动的,却是这看似平常的只言片语。

准确说来,是“不管心情好坏”让我不再向前浏览。我在此陷入了沉思,掉进了回忆,久久难以自拔。我从2011年1月11日开始写微博,到现在已进入第10个年头。从年近六旬,写到年近古稀。这期间,多少喜怒哀乐,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幸与不幸……

不过,我并没有把这些心情全都写进微博,从中大体剔除了“哀”与“悲”。报喜不报忧,人之常情,我也如此。不想用个人痛切的忧伤、悲哀影响朋友们的心情。我年纪不小了,老泪纵横,谁看了都会难过,却又不知如何安慰。而另一原因,我倾向于认为,一个人,一个男人,真正的悲伤都是说不出的。抑或,说得出来的悲伤都不是真正的悲伤。有人说,任何说得出的悲伤,都是对悲伤的亵渎。

然而,即使在那样的悲伤当中,亦即,不管心情多么不好,我也几乎每天都坚持写这140字的微博。这未必是每一位网友都能意识到的,而那位网友意识到了。也的确如他所说,这很不容易。是为了钱吗?不,一分收益也没有;是为了名声吗?名声这东西,若年近六旬还没有,还能有吗?即使有,又有多大意思呢!那么是为了影响不成?若说我在社会上有一点点影响,那主要取决于我的八九十本译作和八九本创作,这140字大可忽略不计。

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种承诺,一种内在的或对于自己内心的承诺;在应该

发声的时候我不再沉默。大到某个敏感的重大社会事件,小到有人挖草坪上的蒲公英,我都尽可能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尽可能以文学的、修辞的、诗意的形式。同时也有对于网友和“粉丝”的外在承诺。最初三年过去的时候,新浪、腾讯、网易、搜狐加起来共有480万“粉丝”,而后虽逐渐剩下新浪微博一家,粉丝仍有330多万。我的虚拟本家豹子头林冲当年也不过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而我有330多万“粉丝”,怎么可以一走了之或掉转头向隅而泣呢?

不妨说,这内外在两种承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个人无论多大的悲伤。我固然不是勇士,但我还是多少知道,一个人,一个男人,很多时候理应当自行包扎伤口,爬起来继续前行。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写了十年之久的这一条条微博,可以视为我个人跌跌爬爬不断前行的记录,记录了前行途中经过的风景和触景而生的心情——不仅有看见草坪上正开的蒲公英被人一株株挖走的惋惜,而且有面对故乡篱笆上噙着晨露的牵牛花的欢欣;不仅有每年眼望研究生像鸟儿一样从自己这棵老树上飞走的惆怅,而且有人在讲座会场目睹甚至坐在地上的男生女生那张张笑脸的感动……

这么说,听起来似乎只是我单方面提供服务,为了履行自己对“粉丝”的承诺而情愿或不情愿地做什么。不,不是那样——与此同时我也从网友和“粉丝”那里获得了许许多多。有快乐时的分享,有消沉时的激励,有审美时的共鸣,有失利时的安慰,也有得意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不言而喻,这些都是我得以持续前行的养料和动力。就此而言,我的微博或许也是某种自他互动的记录。

也有学者对微博写作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完整,碎片化,140字能表达什么呢!碎片诚然是碎片,而另一方面,无论唐诗宋词还是元曲小令,绝大多数都不超过140字。绝句仅仅20字,十六字令寥寥16字,但能说它们支离破碎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有时我甚至觉得——也可能是错觉——写1400字易,写140字难,写14字更难。也巧,刚才看《中华读书报》,偶见郁达夫七律《钓台题壁》的颔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不禁沉醉有顷。14字,平白如话,然而含有何等丰沛的意象和苍凉的感慨啊!

当然,微博以“吐槽”“卖萌”甚或“显摆”居多,并非写诗。但若以创作、以写诗的态度来写,也并非不可以成为诗意创作。恕我不懂谦虚,例如前几天我写了如下140字的微博:“让我再显摆一张照片,本校首席摄影师的专业作品。艺术高于现实吧?是啊,老夫聊发少年狂也好,将谓偷闲学少年也罢,反正花前月下的确能让让人不再老气横秋,而得以回归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少年情怀。尤其樱花,开时轰轰烈烈,漫天飞雪;落时毅然决然,一路花雨,颇有某种欢快而不无悲壮的人生况味……”同时配了一幅樱花

树下仰天大笑的照片(阅读7.2万,转发14,评论67,点赞450)。

我的做法,除了本职工作的教学和附带性的翻译,创作方面,一周的所思所感大体析离出一篇散文或随笔,不止1400字;一日的所思所感大体聚敛为一则微博,至多140字。微博也写在本质上,初稿一般都要超出140字,而后一改再改,一减再减。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一种语感,一种行文习惯:宁简勿繁,宁少勿多,宁“瘦”勿“肥”。恕我好为人师,建议你写写,如何?



微风(油画) 张立农



你也可以像这里的人一样

王峰

熟悉江宁,是在有了孩子之后。

在此之前,像我这种急于打拼急于扎根的新南京人,江宁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有个死党是江宁土著,有一年清明,他回乡下扫墓,随手发了两张图片过来,一张里水草丰茂,蓝天白云之下,一只牛儿独自在河边吃草;还有一张是一堵青灰砖墙,在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里兀自斑驳着岁月的痕迹,说那是他们家的祠堂。

朋友的江宁就在一个不远的地方,天是那么高,那么蓝,就像我们已经回不去的故乡。

岁月在长,而我们却不再像年轻时一往无前。可是,我们年轻时不都向往着一种热闹吗?我们历经千辛万苦从农村来到城市,不就是为了能像一个人城里人那样生活吗?那时还是单身,并不像别处的食客总是吃得那么热火朝天——据说,都是得提前预订才行,而且每天的数量都是限定的,过了这个点,想吃也吃不上。一个外乡人的味蕾里总是藏着他的乡愁,那晚,就着鲜美的土鸡汤,我竟然扒拉了两碗米饭。

那之后,我们各自在城里工作,在城里和姑娘们谈恋爱,貌似过着和所有人一样稀松平常的生活。

江宁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不断制造奇迹给你惊喜的地方,随着城市生活的外延,江宁跟主城区的联系正越来越紧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方山脚下的江宁大学城办事,从逼仄的主城来到这里,呼吸一下子都畅快了很多。突然想起多年前朋友曾推荐我到此买房,说这里环境如何如何。结果当然是未遂。正懊恼中,看到附近有一条路叫格致路,细细啜摸,竟觉得再贴切不过,满眼的一片春色,正在天空之下铺陈着、渲染着、盎然着,心头不由涌起一股悔意。

孩子出生后,在春暖花开之际,我们会在朋友圈、在百度地图里搜寻着什么,做了父亲,就会知道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最好能提供便利的交通,优美的环境,潮湿的空气,还有新鲜的食物……我们去横溪石塘人家参加市集,那是一次对自然、空气、土地、植物、劳作以及质朴生活方式的深度体验。大家出售自己亲手制作的食品和手工艺品,导演在卖酒酿,音乐人在叫卖自己烤的羊肉串,主持人吆喝着自己做的奶茶,还有作家炫耀着自己串的手串。我们一家人骑着三人自行车,一路看一路逛,渴了累了就在路边买个黄瓢西瓜啃起来。音乐飘荡在石塘人家上空,风在为音乐打着拍子,空气在有律动地舞蹈,而我的孩子正仰着一张兴奋的脸在小河边荡着秋千。有美术生在附近写生,一时竟辨认不清,究竟是在作画,还是人就在画中。

自那个初夏的文艺市集,我们一家开启了每周末的江宁之旅,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去世回桃源摘桃子,你在哪家坐定吃饭,就可到他们家的庭院里自己去摘桃子;大一点了,我们去黄龙岘参加帐篷大会,山就在不远处,孩子在帐篷外面放着风筝,我们慵懒地躺着,直到太阳下山才依依不舍地收拾东西回家;再大一点,我们带她去杨柳村九十九间半……

江外无事,宁静于此。我只是想告诉孩子,你也可以像这里的人一样,延续他们祖上曾经有过的那样的生活,慢,而恬淡。

可否先将这一堵墙拆了

吴基民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乘坐轮船,从天津来到上海。

陈独秀之所以来上海,一是为了逃脱北京警察厅对他的监视与追捕;二是五四运动后,他深深感到“以20世纪政治眼光观之……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是太息者也”。他觉得,想要救中国,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思想,一股新的力量,一个新的阶级!

陈独秀抵沪不久,就被他的同乡好友柏文蔚接了过去,住进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柏公馆”。这是一座典型的石库门房子,独门独户,一客厅一厢房,上下两层。于是一系列轰轰烈烈、深深影响中国的大事,都在这幢房子里发生了。

如影随形。陈独秀到哪儿,《新青年》编辑部就搬到哪儿。从1919年5月起,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始终挂在老渔阳里2号的外墙上。

1920年4月末,陈独秀在这里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28篇文章,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5月初,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沈玄庐、施存统、王仲甫7人在此聚会,

商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目的是加快翻译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以这个研究会的名义出版的。

也是在4、5月间,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特派全权代表维斯基一行5人来华,了解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情况。他们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他们当时居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6号,朝东走不远便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由于他们来沪执行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所以他们的住所对外是绝对保密的。而新渔阳里1919年才刚刚造好,租居在6号的是陈独秀的好友戴季陶。陈独秀带他们到戴季陶家,与戴季陶以及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邵力子等相聚。1920年6月,戴季陶搬走,这里由杨明斋出面租了下来。他们对外挂了“中俄通讯社”(后改名华俄通讯社)的牌子,2楼亭子间便由杨明斋居住。维斯基也经常在此休息。

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李汉俊5人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后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为“共产党”。

1920年8月初,老渔阳里2号发生了一

件历史性的重大事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是这样表述的:“经过酝酿与准备,在陈独秀的支持下,上海的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1953年,幼年的我随母亲从愚园路荻村搬到巨鹿路成都南路口德隆邨(即成都南路6弄64号),一住就是45年。从我家到新渔阳里步行不到5分钟。我不记得曾多少次走过新老渔阳里了,只记得当时这两条弄堂是相通的,中间有一扇大栅栏式的铁门,门上正反两边都有一个大的插销,但不上锁,插上了,手伸过去就能打开。可想维斯基一行从新渔阳里6号踱步到老渔阳里2号,只需两三分钟时间。据杨明斋回忆,维斯基到陈独秀处议事,至少10多次。陈独秀有时也来新渔阳里,但大多是散散步、歇歇腿、喝杯茶。192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指导下,经陈独秀倡导,准备发起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维斯基就提议可以在新渔阳里6号开会。8月22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为书记。

会议召开以后,团中央的机关也设在这里。俞秀松就住在2楼另一个亭子间,与杨明斋为邻。为了掩护团中央机关,9月初便在此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公开挂牌招生。实际上这里应该是中共最早的“党校”。学社由杨明斋负责,维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在这里教授俄语。先后来此读过书的有60余人,包括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从中还挑选了20余人到莫斯科学习。这个学社一直到1925年8月才关闭。

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到会的有各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陈独秀、李汉俊以“参观员”身份出席了会议,陈独秀还发表了演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

新老渔阳里都是由一家天津的名为义品房款银行投资兴建的。新老渔阳里也就是由这么两条最普通的弄堂贯通起来的,行走在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先辈们留下的气息。20世纪50年代末大炼钢铁时,铁门拆除了,弄堂变得更通畅。但记得不得是什么时候,在原先的铁门处砌了一堵墙,生生把新老渔阳里隔断了……

我们现在讲要恢复与保持历史的旧貌,可否先将这一堵墙拆了呢?

四史教育

99个瞬间

新上海成长史

99 Moments of Shanghai

影像展

预约须知
工作时间可拨打
联系电话: 021-63510135

展览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816号解放日报社A2楼